

地方理工类高校“专创融合”教育模式的构建与探索

朱怀森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国家对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前所未有地迫切。地方理工类高校作为培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主力军的重要阵地,其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关系到地方产业升级与创新动能。传统的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两张皮”的现象,已成为制约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瓶颈。因此,构建以“专创融合”为核心的新型教育模式,不仅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地方理工类高校实现特色发展、提升服务地方能力的战略抉择。

一、以课程体系重构为核心,筑牢“融合”主阵地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实现“专创融合”,首要任务是将创新创业教育的理念、知识与能力要求,有机嵌入专业教育的全过程,重构“通识、专业、双创”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首先,改革教学内容与方法。教师在讲授专业理论时,引入该领域颠覆性创新的经典案例;在实验、课程设计中,增加探索性、设计性环节,变“验证性操作”为“创造性构想”,将创新思维、批判性精神、团队协作意识的培养,如同盐溶于水般融入专业知识传授中。其次,开发层级递进的“专创融合”课程群。

学校面向低年级学生,开设通识必修课,打下创新方法论基础;面向中高年级学生,开设与专业方向紧密结合的限定选修课,引导学生基于专业技术寻找创新点;面向学有余力的学生,开设以真实项目为驱动“高峰体验课程”,模拟或直接参与从技术研发到产品原型、再到商业计划的全过程。最后,推动课程教学模式改革。高校广泛采用项目式学习、案例教学、翻转课堂等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将课堂从知识传授的场所转变为思想碰撞、创意诞生的空间。通过“做中学”“创中学”,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刻理解专业知识如何转化为社会价值,从而筑牢“专创融合”的主阵地。

二、以实践平台搭建为支撑,打造“融合”练兵场

“专创融合”的本质是实践,必须为学生提供将创意转化为现实、将技术应用到场景的“练兵场”。地方理工类高校应整合校内外资源,构建“点一线一面”结合的多维实践平台体系。在“点”上,要升级改造传统实验室。推动基础实验室向“创新工坊”转变,配备开源硬件、快速原型制造设备,并向学生团队开放预约,支持其进行低成本试错和快速迭代。在“线”上,要建设跨学科创新平

台。打破院系壁垒,组建以解决复杂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创新中心”。这些中心不仅是科研平台,更是学生跨学科项目团队的孵化器,促进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在碰撞中产生创新火花。在“面”上,要深化产教融合,共建校外实践基地。主动对接地方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龙头企业、科技园区共建产业学院、实习实践基地和协同创新中心。将企业的真实技术难题、研发项目作为学生的毕业设计或创新课题,推行“产业导师”与“学术导师”双导师制,让学生在真环境中练就真本领,真正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

三、以师资队伍优化为关键,培育“融合”引路人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是推动“专创融合”的关键执行者。目前,高校教师普遍存在专业知识深厚但创新实践经验不足的结构矛盾。优化师资队伍,需“引育并举,双向流动”。一方面,实施“双创师资培育计划”。通过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创新方法、创业指导等专题培训,选派骨干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参与技术研发,提升其自身的创新实践能力与项目指导水平。同时,鼓励教师将自身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案例和创业项

目,实现教研相长。另一方面,拓宽“双师型”教师引进渠道。大力从企业、科研院所引进兼具深厚专业背景和产业视野的高级工程师、研发总监担任兼职教师或产业教授。建立“创新创业导师库”,聘请成功创业者、投资人和校友担任学生的创业导师,通过讲座、工作坊、一对一辅导等形式,为学生带来一线的市场洞察与实战经验。通过打造一支既懂专业又通创新的“引路人”队伍,为“专创融合”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总而言之,地方理工类高校“专创融合”教育模式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以课程体系重构为“纲”,以实践平台搭建为“目”,以师资队伍优化为“魂”。唯有三维联动、协同发力,方能纲举目张,有效破除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之间的壁垒,培养出既精通专业技术又具备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素质工程人才,为地方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作者系桂林理工大学审计处助理研究员;本文系广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高校创新创业教育、高等教育国际化专项重点课题地方理工类高校“专创”融合教育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021ZJY1407)阶段性研究成果】

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现实挑战与融合路径探析

朱兴梅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其效能直接关乎政权稳固、社会和谐与人民福祉。传统科层制下的基层治理,长期面临信息传递耗散、响应机制迟滞、资源配置粗放、多元主体协同乏力等结构性问题。与此同时,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浪潮蓬勃兴起,不仅深刻改变了经济与社会运行方式,也为基层治理创新注入了强劲动能。近年来,我市顺应时代发展需求,大力推进智慧乡村建设,制订《新乡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持续完善综治网格化信息平台、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将所有政务服务事项整合到一个门户网站,实现“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推动数字技术与网格治理深度融合,但是在实践中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实践中的主要矛盾和挑战,旨在构建一个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的路径框架。

一、从“赋能”理想走向“赋能”实践的障碍

(一)技术嵌入的“悬浮化”部分地方将数字化简单等同于硬件堆砌与系统搭建,出现了“重建设、轻应用”“重技术、轻业务”的倾向。一些繁复的技术应用与基层实际需求脱节,成为“数字花瓶”或“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而基层干部疲于应对各种APP打卡、系统填报,技术非但没有减负,反而成为“数字枷锁”。

(二)数据流转的“壁垒化”“数据孤岛”现象依然突出。出于权力、利益或安全顾虑,不同部门、层级间的数据共享意愿低、标准不统一、机制不健全。虽然技术平台可以“物理联通”,但业务与数据却难以“化学融合”,导致实践中数据无法有效汇聚、融合与活化,使得大数据分析、跨部门协同治理难以深入。

(三)主体能力的“差异化”对于老年人、低收入群体、数字技能不足者而言,过度依赖数字渠道可能使他们被排除在公共服务与社会参与之外,形成“数字鸿沟”。同时,基层干部的数字素养也存在差异,部分人员难以驾驭新技术、理解新思维,导致“不会用、不愿用、不敢用”,制约了赋能效果的发挥。

二、融合路径:迈向技术与治理的深度融合

超越挑战,实现真正的数字赋能,必须推动从“技术应用”到“治理融合”的范式转型,这需要一套系统性的路径设计。首先,制度重构为数字赋能提供规则保障。从顶层设计入手,制定国家层面的基层治理数字化战略与标准体系。重点完善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和安全治理等基础制度,通过立法或行政规章明确数据共享的权责边界与激励机制,以解决实际问题、提升群众满意度为核心,杜绝数据形式主义。其次,提升多元主体的数字素养与治理智慧。一方面,对基层干部进行系统培训,重点培养其数据思维、平台运营和在线群众工作能力;另一方面,面向居民特别是弱势群体开展数字技能普及与服务,保留必要的线下传统渠道,推行适老化设计。再次,在技术应用中坚守伦理与人文关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守护社区温度、邻里情感与人文关怀,利用技术更好地识别和满足人的多样化、深层次需求,防止治理的“去人性化”。建立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和算法问责机制,确保技术应用符合公平、公正、透明原则,贯彻“最小必要”原则收集数据,加强群众隐私保护技术应用。

三、结论与展望

数字赋能基层治理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其终极目标并非建造“技术的巴别塔”,而是构建更具韧性、更富活力、更加公平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与实践表明,成功的赋能绝非技术单方面的“攻城略地”,而是技术逻辑与治理逻辑在制度保障下的一场复杂而精妙的“双向调适”与“深度融合”。唯有如此,数字技术才能真正从缥缈的“云端”落入治理的“泥土”,深深扎根于中国基层社会的丰富实践,最终开花结果,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而智慧的根基。

【作者单位:中共新乡市委党校。基金项目:新乡市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我市数字赋能高效能社会治理路径研究”(项目编号:B25219)】

数字化转型赋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薛刚

当前科技革命对全球经济进行重塑,具有高渗透性以及强带动性的数字经济成为新的增长极。我国体育产业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着成本上升和供需错配的挑战。数字化转型属于全方位变革,其凭借数据要素流动打破空间限制,给产业结构优化带来了契机。此次转型不单单是技术的迭代,更是突破传统体育产业低效陷阱、提高全链条价值的战略抉择。探究其内在逻辑、现实阻滞与实践路径,对体育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大有助益。

一、数字经济赋能体育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

在数字经济时代,通过宏观要素配置、中观结构优化以及微观商业重构构建赋能机制。数据作为其中的关键要素,具备非竞争性和低边际成本的特性,可替换部分传统要素,同时降低交易成本,从而运用全要素生产率。数字技术将渗透运用到体育生产消费的整个生命周期里,对价值创造机制进行重构,推动产业由原本的要素驱动朝创新驱动进行

转变。产业链的融合能够得到加速发展,进而促进体育与旅游、康养等业态协同发展,并借助长尾效应优化产业结构,极大程度增强了供应链的整体韧性。而且数字化还推动着商业模式朝着消费者主导的方向转变,智能算法能够捕捉到个性化需求,反过来促使供给侧进行柔性生产,以实现从标准化供给到精准供给的跨越,有效化解了供需错配这一矛盾。

二、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现实阻滞

虽说我国体育产业数字化的前景一片光明,但其进程依然面临着重重阻碍,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与数据壁垒问题同时存在。部分场馆没有智能采集设备,且数据分散在不同的部门和机构,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共享机制,导致数据价值难以挖掘,进而阻碍了产业的融合。区域之间数字化发展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大了产业内部的数字鸿沟,导致欠发达地区很难接入数字经济红利。体育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面临着转型成本过高的困境,软硬件采购和流程再造投入巨大,

再加上利润较薄和战略不清晰,导致企业陷入不敢转型的僵局,造成了产业发展断层。另外,复合型人才出现结构性短缺成为关键瓶颈,在现有教育体系下,体育和数字技术专业的融合不足,人才供给和产业需求不匹配,从业人员数字素养欠缺,无法适应智能化生产管理的要求,且面临结构性失业的风险。

三、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

面对挑战,需从多维度协同着手构建良性数字生态。夯实数字“底座”,开展智慧场馆和物联网建设,打破行政壁垒构建体育大数据中心,制定统一标准,推动数据的开放与共享,搭建产业云平台以实现精准决策。政府应牵头建设体育产业数据公共服务平台,将市场主体数据获取与使用成本降低,使得要素流动渠道畅通。鼓励企业运用数字技术重塑商业逻辑,推行智能制造及柔性生产,以安踏等企业为榜样,借助直面消费者战略反向推动供应链升级,满足个性化需求;加强体育制造和现代服务业的关联,凭借工业互联网平台来打通上下

游数据通道,在新零售端依靠混合现实技术扩展消费边界,构建适宜数字经济的治理体系以及人才机制,政府必须转向数字化服务并健全数据法规;深化产教融合,鼓励高校开展跨学科培养,建立能契合数字化需求的人才评价动态调整机制,支持校企一同构建实训基地,从根本上解决人力资本错配的问题,为产业转型提供智力支持。

四、结语

数字化转型是体育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是建设体育强国的有力引擎。在数字时代浪潮下,我国体育产业应主动迎接变革,借助夯实数字基础设施、深化产业融合创新、完善人才与治理体系的方式,消除当前遇到的数据壁垒和转型困境。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新,更是一场全面的产业革命。随着数字技术与体育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逐步形成结构更为优化、效率更高、更富创新活力的现代体育产业体系,为国民经济稳步增长和人民生活品质提升注入强大动力。

(作者系中共商丘市委党校讲师)

华侨农场中“全球地方化”与“地方全球化”的双向建构研究

杨扬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全球”与“地方”的关系已成为人文社科领域的核心议题。早期全球化理论常被视为一种同质化的、自西向东的单一进程,但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协商的复杂网络。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地方化”与“地方全球化”作为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为我们理解全球力量的地方性适应与地方文化的全球性传播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跨国公司、全球城市或大众文化领域,对于在特定历史政治背景下形成的、具有过渡性和边缘性的社区关注不足。新中国成立以来,为安置从东南亚等地回国的侨胞,在广东、广西、福建、云南、海南等地兴建的华侨农场,正是这样一个被学术界长期忽视却极具理论价值的“社会实验室”。它既非传统的乡土村落,也非现代的城市社区,而是国家力量、全球流动与地方情境共同“浇筑”的独特空间。

本文认为,华侨农场是观察“全球地方化”与“地方全球化”双向互动过程的绝佳案例。它既是全球地缘政治变局在当代中国引发的“地方化”回应与安置方案,又是归侨群体携带的跨文化种子在特定制度土壤中生长、并重新参与全球文化循环的“全球化”起点。

一、“全球地方化”“地方全球化”与“第三空间”

“全球地方化”一词,经社会学家罗兰·罗伯逊等学者理论化,强调全球性与地方性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在相互渗透、相互塑造的过程。其核心在于,全球通用的产品、理念或制度,必须在特定的地方文化、法律和消费习惯中进行

调整与适应,才能成功“落地”。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适应性过程,体现了全球力量本土性转化的过程。

“地方全球化”则是一个逆向但并行的概念,它指地方性的文化、产品或身份,借助全球化的网络、市场和媒介,获得超越本土的可见度、影响力与流通性。这可以是地方特产成为全球商品,也可以是地方文化实践吸引国际游客与关注,成为一种“自下而上”的能动性过程。

在华侨农场的语境中,这两个概念获得了具体的历史案例。农场的建立本身,就是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应对“全球”侨民回流这一挑战的“地方化”解决方案。而农场内部生成的文化,又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地方”,并寻求向外、甚至向全球网络传播其声音与特色。

二、制度嵌入与空间生产:作为“全球地方化”实践的农场建立

20世纪50至70年代,印尼、缅甸、越南等国的大批华侨华人回国。这股由全球地缘政治激发的移民潮,对中国而言是一个需要紧急应对的“全球化”问题。

中国的回应,是极具特色的“全球地方化”实践,创造性地运用了当时国内主流的社会主义组织与建设经验,将归侨安置问题转化为国家建设的一部分。

1.制度的本土化嵌合

国家通过侨务系统,将归侨迅速纳入“单位制”这一中国城市社会管理的核心制度。华侨农场被定性为“国有农场”或“集体农场”,归侨及其家属的身份在“海外侨民”转变为“国家职工”与“农场居民”。这一转变至关重要,它意味着归侨被纳入与国内其他国有农场相同的计划生产、物资分配、

福利分房和政治学习体系之中。同时,这也是身份的重塑。安置行为被赋予崇高的政治意义,从而将全球流动带来的潜在不确定性,转化为巩固国家认同的政治资源。

2.空间的战略性生产

农场的选址极具战略考量,多数位于广东、广西、云南、福建、海南等沿海或边疆省份。

这种空间安排体现了双重的“地方化”逻辑。经济方面,开发荒地,种植橡胶、热带作物,符合国家战后经济恢复与农垦发展的需要。而在政治与安全方面,在边疆地区安置具有海外联系的群体,并使其安居乐业,客观上起到了“屯垦戍边”、巩固国防、稳定边疆的社会效果。

通过制度嵌入与空间生产,国家成功地将一场全球性的人口危机,消化、整合进本国特定的政治经济体制与领土空间秩序之中。华侨农场因此成为一个由国家主导、高度“地方化”的全球化解决方案的实体结晶。

三、作为“地方全球化”进程的侨乡生成

国家的制度安置并未完全消除侨带来的文化异质性。相反,在相对封闭的农场单位内,归侨社群凭借其集体记忆与文化习惯,将农场从一个单纯的安置点,逐渐改造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飞地”,并开启了“地方全球化”的进程。

1.在内部生成的“第三空间”中的文化杂糅

在农场的日常生活领域,一个鲜活的文化杂糅空间悄然形成。饮食方面,印尼沙爹与当地香料结合,催生出独特的“侨乡烧烤”;东南亚的咖啡种植与饮用习惯被保留和发展,与传统茶文化并

存。语言方面,在普通话和当地方言的包围中,形成了夹杂着马来语、印尼语、闽南方言词汇的“农场普通话”,成为内部的身份标识。此外,服饰、音乐、建筑风格等都留下了鲜明的文化烙印。这种杂糅文化,既不是纯粹的原乡复制,也不是被动的本土同化,而是在如霍米·巴巴所言的“第三空间”中生长出的、具有高度适应性与创新性的新文化形态。

2.从文化“飞地”到“全球化节点”这种独特的“侨乡文化”并未止步于农场围墙。它通过多种路径,实现了“地方全球化”的扩散与连接。农场的特色饮食、咖啡店成为周边居民体验“南洋风味”的场所;婚嫁与日常交往使得部分文化元素被本地社会吸收。农场归侨通过侨汇、书信以及后来的探亲与越洋电话,始终与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的亲属保持紧密联系。农场不仅是接收端,也成为信息与情感向海外传递的源头,是全球化华人网络中的一个活跃节点。

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将华侨农场打造为“侨乡文化旅游”目的地。例如,兴隆华侨农场推广“咖啡文化之旅”,建设东南亚风情园。本地文化被包装成可供消费的“全球地方性”商品,吸引国内外游客,从而以一种新的方式参与全球文化经济循环。

四、双重进程中的身份协商与社区转型

“全球地方化”与“地方全球化”在华侨农场并非两个割裂的阶段,而是持续交织、充满张力的共生过程。这种张力集中体现在身份认同与社区发展两个层面。

1.身份的流动性

归侨及其后代的身份认同处于持

续的协商之中。他们首先是新中国公民和农场职工,享有并承担相应的权利与义务。但“归侨、侨眷”的标签又使其在升学、就业、出国政策上享有一定照顾,成为一个制度性的“特殊群体”。在家庭内部和社区节庆中,他们是南洋文化的承载者;在对外交往和公共生活中,他们又是地道的“本地人”。这种双重乃至多重文化能力,构成了他们独特的文化资本。他们与海外亲属的情感与经济联系,使其身份始终带有跨国色彩。这种联系在改革开放后得到加强,也使农场社区的发展深受侨汇、海外信息和观念的影响。

2.社区的转型

随着社会的发展,华侨农场经历的深刻的社区转型,华侨农场从单一的计划种植,转向农业、旅游、加工等多元化经营。对“侨”字招牌的文化资源进行开发,成为重要的转型策略。此外,华侨农场逐步从纯粹的国有农场体制向地方行政建制过渡,社会管理职能日益突出。

与此同时,国家早期的同化预期与社区文化的持久韧性之间始终存在微妙平衡。当“地方全球化”进程过度商业化时,可能引发社区内部对于文化真实性与主体性的担忧。同时,年轻一代的外流也给社区的文化遗产带来挑战。

这些互动与张力表明,华侨农场作为一个社会空间,始终处于国家力量、全球流动与地方社群能动性三股力量的拉扯与塑造之中。它既是全球化理论在我国的一个微观实现,也是对我国特有的社会整合与文化发展模式的具体诠释。

五、结论

通过对华侨农场历史与现状的考

征稿
xxrbll@126.com